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残疾人教育事业^{*}

陆德阳

19 世纪中期,一部分为传教而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关注到了身处社会最底层的残疾人这一弱势群体,引入西方近代残疾人事业理念,率先创办残疾人学校,面对中国民众强烈反对外来宗教的社会现实,主张残疾人学校脱离教会、独立发展,得到了中国官僚、绅商、知识分子和市民的支持。迨及民国初期,为了得到更多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传教士淡化了残疾人教育中的宗教色彩,除了继续新创办残疾人学校之外,还培训残疾人教育师资,援助国人创办残疾人学校。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人民掀起了“收回教育权运动”,多数经办残疾人学校的传教士顺应形势的发展,向中国政府申请立案、注册,纳入了中国的教育体系之中,实现了中国化的转向,成为中国残疾人教育事业的一个部分。

关键词: 近代 残疾人 传教士 教育

作者 陆德阳,1953 年生,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

一、绪 言

关于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中的成就、地位、作用和影响是近代史研究、近代残疾人事业研究和近代传教士研究等学界共同关心的热点和议题,至今已取得了相当引人注目的成就。主要论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传教士是近代中国残疾人教育事业的主流和最主要推动力。其二,传教士的残疾人教育事业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下展开的,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人们曾基本否定其作用。其三,分述中国人和传教士为近代残疾人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片面强调两者之间的分歧与不一致,割裂了互动与相互促进。

厘清这一课题,有助于辨明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残疾人教育事业的动机、目的,期间是怎样根据社会的发展和残疾人事业的推进不断调整办学宗旨与教学内容、保持与中国政府和民众的互动的,从而更准确地定性传教士在近代残疾人教育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宣传与实践近代残疾人教育理念:1835—1911

近代残疾人教育^①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物,最早由传教士传入中国,并付诸实践。1835 年,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史”(上古—1949)(11YJA770036)的阶段性成果。

^① 对残疾人的教育统一称之为“特殊教育”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之前对此并未做出规范,常称作“缺陷教育”、“残障教育”、“特种教育”、“特殊教育”、“残陷者教育”、“残不废教育”等。本文将近代对残疾人的教育称之为“残疾人教育”,分类则称之为“聋哑教育”、“盲人教育”。

传教士郭士立夫妇在印度与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的赞助下,创办了澳门女塾(附设男塾);1874年,苏格兰圣经公会传教士穆瑞创办瞽叟通文馆;1887年,美国传教士米尔斯创办登州启喑学馆(后易名为烟台启喑学馆);1889年,美国北美长老会传教士、医生赖马西创办广州明心瞽目院。^①

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传教和发展教徒,创办残疾人学校当然与此密切相关。“通过聋教育——一项在中国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传教的工作将会受益无穷。……成功地教育聋人也可以显示神圣的宗教力量。如果能把愚昧无知的聋孩子教育成为有用之人,并教他们说话,那么当中国人看到在基督教的名义下所做的这些善事后,就一定会更容易从做这些工作的人们身上接受他们的宗教信仰了。”^② 1839年,澳门女塾停办时,附读的3名盲女“已自能诵习《圣经》及《天路历程》二书矣”。^③ 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传播教义、发展教徒都是传教士创办残疾人学校的首要 and 重要的任务。

但是,传教士创办残疾人学校的动机和目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他们踏上中国大地后,亲眼目睹了残疾人触目惊心的生存状况和身体、精神上遭受到的双重折磨,秉承基督教教义,仿效西方创办残疾人学校,欲通过教育和训练让残疾人掌握交流手段和基本知识,以弥补自身的缺憾,恢复正常的生活,摆脱依赖他人生活的境地,根本改变命运,具有全新的意义。

虽然说传教士创办残疾人教育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于国于社会于民于残疾人都有利,但是在19世纪的中国遭到了冷遇。清政府既不干涉,也不承认:“外国人在内地设立学堂,奏定章程并无允许之文;除已设各学堂暂听设立,无庸立案外,嗣后如有外国人呈请在内地开设学堂者,亦均无庸立案。”^④ 无庸立案一语虽然可以理解为政府不枉加干涉、限制,但同时也表明了此类学校尚未获得合法地位,不能得到国家的资助、保护,名不正而言不顺,信任度严重受到影响,被视为教育界的异类。执掌政权的官员通常会与政府保持一致的观点,或者“只会嘲笑我们,视我们为异教”;^⑤ 或者公开表示“对此事并无兴趣”。^⑥ 即使是残疾儿童及其家长,也多持怀疑和不信任,认为让盲聋哑孩子上学,简直就是疯狂,是“外国人狡猾的骗局”,^⑦ 必须群起而攻之。^⑧

19世纪创办残疾人学校的传教士普遍持有为了事业的实现而百折不挠的精神。面对困难和不被理解,他们并没有泄气和放弃,而是首先想方设法把残疾人学校创办起来,表现出了积极进取精神。西方近代残疾人学校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拨款、社会捐赠和个人出资。但是,在中国政府无庸立案、官员和民众普遍反对的情况之下,传教士只能依靠通过自行向国外吁请赞助和个人出资来筹措办学的第一笔资金,这几乎是19世纪中期创办残疾人学校的传教士的共同行为。苏格兰传教士戈登·库明在调查瞽叟通文馆时,“了解到学校规模仍如此小并且资金匮乏”,于是“将自己相当一部分财产捐给了这所学校,并为其筹集了其他资助”。^⑨ 烟台启喑学馆的办学

① 关于近代中国残疾人教育的起源有诸说。请参见:郭卫东《论中国近代特殊教育的发端》、《基督新教与中国近代的特殊教育》;郭大松、曹立前《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启喑教育》等。

② 孙桂华、刘秋芳:《烟台启喑》,济南: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页。

④ 《学部咨各省督抚为外人设学无庸立案文》,《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1077页。

⑤ 孙桂华、刘秋芳:《烟台启喑》,济南: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⑥ 谢赐业:《广州市精神病医院简史》,《芳村文史》,1989年第2期。

⑦ 孙桂华、刘秋芳:《烟台启喑》,第25页。

⑧ 杜文昌:《聋哑教育及私立北平聋哑学校之概况》,《中央日报》,1936年10月20—21日。

⑨ Tanya C. Hart:《中国盲文体系的发明者和中国第一所盲校的创办者》,北京盲人学校资料。

经费主要来源于美国聋校、聋人和关心聋人工作的朋友们的帮助。^①1900年,米尔斯夫人用丈夫病逝所得的人寿保险费及其全部存款作为资金的一部分,在东山海滨购得一块土地,修建了一座小楼房作为校舍。^②传教士通过向国外募捐集资和个人捐助筹措经费,不仅在中国大地上率先创办起了学校,而且开创了集聚社会力量、资金办学的新风。学校的经营理念是非营利性的,具有慈善性质,不仅免除残疾学生的学费、书费,而且还视学生情况免费提供食宿,以吸引那些有衣食之忧的聋哑盲童。

从决定创办残疾人学校、致力于通过教育改变残疾人的命运之时起,传教士就面临一个严峻的现实:“中国人大都对基督教有着强烈的反感,不愿意接受外国人带来的宗教信仰。”这一现状迫使以传教为己任的传教士做出艰难的抉择:若将传教作为主旨,必然遭到包括残疾人在内的中国人的反对和拒绝;若要吸引残疾学生自愿前来报名学习,必须改变残疾人学校隶属于教会的现状。一些有志于发展中国残疾人教育事业的传教士选择了后者。米尔斯提出:“将学馆作为任何派别所属的传教机构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不希望将聋教育纳入任何派别的宗教团体”。主张将残疾人学校与教堂、教学与传教相分离,使得中国的残疾人教育从一开始就呈现出脱离教会的管束、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特色。在课程设置中,交流手段、文化常识和劳动技能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削减了有关宗教的内容。这些调整 and 变化,使得传教士的身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具有双重特点:既是传教士,又是残疾人学校教师。他们原来是为了传播基督教而进入中国的,因此传播宗教是其本分;作为残疾人学校教师,必须考虑残疾学生的需求、遵循残疾人教育的规律,通过教育使残疾学生掌握交流手段、文化知识和谋生手段等一技之长,而且随着学校和时代的发展,这些内涵必然会越发得到强化和重视。

为了打消人们的疑虑,让更多的人了解残疾人教育,将残疾儿童送进残疾人学校学习,传教士采用多种方式宣传残疾人教育的意义。其一、家庭访问。深入了解残疾人及其家庭的实际情况、迫切愿望和要求,向他们介绍残疾人教育的作用与意义,希望家长能把孩子送入学校学习。烟台启喑学馆创办之初,米尔斯走访了附近44名聋孩子的家庭。^③其二、社会宣传。组织学生走上街头,让聋哑学生读、写、“说话”,让盲童“看书”,用事实展现残疾人教育的成果。1888年,穆瑞组织了6名“北京盲校的年轻学生在大街上大声朗读。这个举动引起了大众的注意,这不仅仅是因为盲人可以念书是个令人感到惊奇的事,也是因为中国人向来对读书人都十分地敬重。很多从来不听外国传教士说教的人都停下脚步观赏和聆听这些盲童的朗读”。^④1908年10月,米尔斯夫人率领1名教师和3名男生赴天津、北京、汉口、上海等16个大城市举行了50多场演说,听众超过3万人次,^⑤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果与影响。其三、舆论宣传。利用报纸、杂志宣传残疾人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介绍近代西方残疾人教育事业的新理念、新发展,反映残疾人的要求、愿望。1899年,苏格兰传教士戈登·库明出版了《数字符号系统的发明者——为中国的失明和文盲人士》,呼吁西方国家关注和援助中国残疾人教育事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⑥同时也使得社会民众、尤其是政府官员和社会名士增加了对残疾人教育事业的理解。

传教士的种种努力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中国民众由之前把前来宣传的传教士拒之门外转而到残疾人学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主动前去参观、访问。上海徐家汇圣母院附设聋哑学校,“闻讯

① 孙桂华、刘秋芳:《烟台启喑》,第15—16页。

② 王立夫:《烟台启喑学校简介》,《烟台市文史资料》,第1辑,1982年。

③ 孙桂华、刘秋芳:《烟台启喑》,第13、12页。

④⑥ Tanya C. Hart:《中国盲文体系的发明者和中国第一所盲校的创办者》,北京盲人学校资料。

⑤ 孙桂华、刘秋芳:《烟台启喑》,第79—80页。

前来参观的中外人士络绎不绝,聋哑儿童教学班声誉随之远扬,特殊教育才逐渐为社会认识并接纳,一些受过近代西式学校教育,思想开明且家境较好的聋哑儿童家长,闻讯后亦有携子女找上门来要求自费上学的。”^①尤其是那些生养了残疾子女的政府官员、社会名士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殷实的家境又足以支付所需费用,他们把孩子送进学校,希望通过接受教育改变命运。这样,不仅增加了学校的生源,而且改变了此前学生大都为街头流浪的弃儿或为父母双亡的孤儿、将学校作为庇身之所、生活之处的现象。残疾人教育的重要性得到了公认,社会风气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传教士苦苦恳求残疾儿童进校学习,而是家长主动把残疾子女送进学校学习。

一些具有开明思想的官员、社会名士耳濡目染了时代新风尚,也开始由冷漠、观望转而关心和支持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教育事业。1908年,米尔斯夫人率领教师和学生赴全国各地巡回演讲,应天津严先生和天津大学校长的邀请做了专场讲演,与会人员一次多达3000多人;学部侍郎严修、直隶总督杨士骧、南京总督端方等人则邀请他们到府上交谈。^②在众多官员和社会名士的支持、帮助下,巡回演讲得以顺利开展,使得更多的国人加深了对于残疾人教育重要性的理解,同时也扩大了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学校的影响。

当然,中国官员和社会名士对于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教育的援助和支持如果总是停留在口头上或只是偶尔为之,也有可能是碍于友人的委托而情面难却的敷衍或无关痛痒的应付。但历史事实证明并非如此。20世纪初,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学校规模逐渐扩大,学生人数增加,产生了经费不足的问题。这时,中国人伸出了援助之手。1902年,上海民众赞助烟台启喑学馆900墨西哥元;^③1909年、1911年、1913年,广州明心瞽目学校收到中国人捐助的1000金币、^④400美元、15000美元的捐款。^⑤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赞助,不仅部分解决了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学校经费不足的问题,而且改变了最初单纯由国外募集资金和传教士个人出资的模式,拓宽了经费来源的途径。

传教士引进西方近代残疾人教育的理念,并在这一时期创办了20余所残疾人学校,给中国残疾人事业带来了新气象,引领了残疾人教育事业的发展。19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在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大背景下,也关注到了残疾人及其事业。最早从国家的层面上构筑发展残疾人事业蓝图的是太平天国的洪仁玕。他提出仿照西方“兴跛盲聋哑院。有财者自携资斧,无财者善人乐助,请长教以鼓乐书数杂技,不致为废人也”。^⑥将发展残疾人事业作为建国的重要内涵,欲通过社会集资由国家创办机构收养残疾人,初步具有近代残疾人事业的特色。但洪仁玕的设想只是一个轮廓式的构图,缺少进一步实施的计划,且教授内容限于鼓乐杂技,与近代残疾人教育存在本质区别。

概而言之,这一时期,传教士不仅在中国大地上最早创办残疾人学校,开始实践残疾人教育,而且逐步得到了官员和社会名士、残疾人及其家属的支持,从而掀开了近代中国残疾人事业新的一页。

三、援助中国人创办残疾人学校:1912—1923

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残疾人教育开始受到国家的关注和重视,在教

① 刘振兴:《法国修女与上海第一所聋校》,《中国残疾人》,1995年第1期。

② 孙桂华、刘秋芳:《烟台启喑》,第81—82页。

③ 同上,第53页。

④ Ming Sum School for the blind (1919),广东省档案馆,92—1—430。

⑤ Moukden. St. Nicholas' Industrial School for Blind Chinese Girls,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年,第326页。

⑥ 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印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90页。

育行政上有了一席之地,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开始启动。《教育部公布小学校令》规定,建立盲聋哑学校必须按普通小学相应的条文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教育部官制》规定,“盲聋哑学校及其他残废学校等特种学校”由“普通教育司掌管事务”;《国民学校令》将盲聋哑学校归“类于国民学校”之列,规定只有“疯癫、白痴或残废不能就学者,区董报经县知事认可后,得免除其父母或监护人之义务”;《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规定了盲聋哑学校的校长和教师的资格;《县视学规程》和《省视学规程》规定了特殊教育设施事项。上述法律法规涉及到的残疾人教育的内容虽然简略,但却明确了其在教育行政中的地位,释放出了国家鼓励和发展残疾人教育事业的信号。

政府对残疾人教育的重视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提高的表现,也大大增强了传教士的信心,促使残疾人教育呈现出一些显著特点。从数量上来看,1912—1923年的10多年间,传教士新创办学校的步伐大大加快,达15所之多,^①给更多的残疾人提供了入学的机会。从地域上看,传教士创办的学校由沿海大城市扩展到内地和一些偏僻的农村,残疾人教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和推广。从学校的各项建制来看,逐渐趋向规范:校舍具有一定规模,教学宗旨进一步明确,课程设置较为合理、科学,学生人数已能单独成班。最典型者为傅兰雅捐资兴建的上海盲童学堂。1911年3月,他捐出13亩地产和6万两银子创办该校,并命儿子傅步兰赴美国考察和学习盲人教育。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学校编制设行政部、中小学部、师范部、聋哑部、工艺部、盲字印刷部等。^②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学校逐步规范和普及,改变了此前建校由于缺乏充分的前期准备,仓促上马,初创时仅有一二名学生,开设课程单一的状况。

传教士创办的包括残疾人学校在内的教育机构增多的社会现象,引起了国家的极大关注。如何指导和规范此类学校成为当时政府有关部门必须考虑的重要事项之一。教育部于1917、1919、1920、1921年颁发了《中外人士设专门以上同等学校考核待遇办法》、《教育部布告第六号》、《教育部布告第十一号》、《教会所设中等学校请求立案办法》等文件,调整了有关教会所办学校的政策:从过去的无庸立案趋向于积极引导其立案,欲将此类学校纳入私立学校范围内加以管理,达到禁止向学生传教的目的,使之符合学校教育的理念。但是,上述中国政府颁布的文件针对的对象是中学或专科以上的学校,并不包括残疾人学校在内;而且在行政措施上仅为引导传教士申请立案,并非严令和强制。尽管如此,部分由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学校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主动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立案,接受指导和管理,得到中国政府批准。^③

从事残疾人教育的传教士为什么会主动向中国政府申请立案呢?原因主要有下述几点。残疾人教育基本上属公益性事业,所需付出极多,而几乎很少有、甚至没有回报,有时甚至连学生的学费、书费都收不上来,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进一步促进发展,得到来自政府的经费支持是不可缺少的;在立案之后,学校取得了合法身份,有利于各项工作的开展;而且,立案手续极为简便,并没有附带苛刻的条件和严格要求,政府采取了相当宽松和自由的举措。

尽管如此,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学校在申请立案之后,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修改了办学宗旨,调整了教学内容,使之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傅兰雅提出:“视察盲徒能力所及,施以完善之教育,俾其毕业后纵不足自贍,亦得为一部分生利之事业,不致在再仰给于人。于是知自尊,而人亦尊之,得独立于社会中也。”^④傅步兰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指出:

①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945—946页。

② 《上海盲童学校简史》,《上海市盲童学校建校90周年纪念集》,2002年,第28—32页。

③ 曹思彬等《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7页。

④ 傅兰雅著,严桢译《盲童教育论》,《中华教育界》,1913年第9期。

盲人教育不是慈善事业,训练盲人并不是为了从饥饿中拯救生命,并使他们获得足够的精神支持以弥补他们空虚的生活,目的是“恢复他们生来就有的权利和自由”,“造就一批有自尊心的、残而不废的公民来”。^①盲人教育是这样,其他类型的残疾人教育也莫不如此。通过实施残疾人教育,不仅能让残疾人自立自强,解决生计问题,而且还能减轻社会负担,有利社会发展,从社会的视角强调残疾人教育的意义。

立案虽然具有一定的限制和约束,但也有利于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学校的发展。华东基督教教育会1919年成立的一个由葛德基主持的“研究政府承认基督教学校的问题”特别委员会的调查研究认为,“学校立案的利益,胜于不立案。”^②证之史实,并非虚言。部分学校在立案后不仅取得了教育行政上的合法地位,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而且促使中国政府官员、社会名士的立场和态度由怀疑、观望转向拥护、支持,一些人员还受邀参加董事会,参与学校管理,大大提高了学校的社会地位,扩大了影响。最为典型的是上海盲童学堂,开学典礼那天,伍廷芳等名流出席,英美等国驻沪总领事,以及“美按察使兴克、美教士前上海副领事海克斯、华侨联合会谢复初等到堂观礼。……由到会诸君担任代为鼓吹,并与傅步兰君力商,将孙中山先生、王博士宠惠、魏君获先、陈博士锦涛加入董事之列,以便华人代为助力推广一切”。^③建校初期的校董会董事包括黄炎培、王正廷、朱培德、吴铁城等人。孙中山卸任中华民国代理总统后也列名董事。这么多的政府高官和社会名士列名校董会,有利于集聚社会的人气、经费的筹集与重大事情的决策,促使学校顺利发展。

此外,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学校在立案之后,列入了中国教育体系之中,在诸多方面名正言顺受到政府的重视与援助。其一,经费资助。1912年,广州教育局批准广州明心瞽目学校立案后,每年拨付经费约2500元,^④来源于国内机构和民众的捐款也明显增多。其二,政府官员和地方名士参加学校重大活动,密切了学校与政府、社会间的关系。1920年6月,上海盲童学堂举行首届毕业典礼,由政府外事长官杨徵为5名初小毕业生、10名手工艺班和高小毕业生颁发了毕业证书,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其三,传教士创办残疾人教育的示范作用得到了重视,并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推广,扩大了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学校的影响。1917年,教育部闻傅步兰将赴美国调查盲哑教育情况,特发函委托他调查万国聋哑教育并希望于调查后详细报部。^⑤其四,促进了传教士与政府间的互动。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学校在这一时期无疑是中国残疾人教育的中心和典范,受到了中国政府极大的信任与重用,并开始承担政府托付的任务。广州地区由于乞讨、卖唱的盲女较多,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经过协商,警察局于1912年将66名瞽目歌女送入广州瞽目明心学校学习和训练,并按月向学校提供这些学生的管教费用。^⑥虽然广州警察局是从社会治安的视角审视残疾人教育作用的,但是,盲女通过学校教育,学到了知识,提高了素质,实现了自食其力;政府提供的管教费用,也解决了学校经费不足的问题,促进了学校的发展。由此可见,两者的合作达到了发展残疾人教育和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双重目的。

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学校在立案之后,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受到社会极大重视,在发展之中开始重视培养残疾人教育师资,培养了中国第一批中国残疾人教育师资。烟台启喑学馆创办之初,米尔斯夫人就提出:“学馆向所有愿意来求学的人敞开了大门,衷心邀请任何一个宗教派别

① 《校长的报告》,1914年校刊。

② 缪秋笙、毕范宇:《中等教育的过去与现在》,《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5卷第4期,1929年12月。

③ 《盲童学校开会记》,《湖南教育杂志》,第2卷第8期,1913年5月15日。

④ 郭卫东:《基督新教与中国近代的特殊教育》,《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4期。

⑤ 《函傅步兰托调查万国盲哑教育并希于调查后详细报部》,《教育公报》,1917年第4卷第9期,第63页。

⑥ “Meng-sam School for Blind. Canton”,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年,第322页。

选送他们当地的教师来校学习。学馆免费为他们提供住所并进行指导,给予他们开办聋校的方法,培训他们关于聋人的教育方法和教育理念。”1901年,学馆再次强调:“学馆希望培养出能够在其他地方开设聋校的教师,从而去教育中国40万‘沉默的人们’,使他们能够真正理解生活的意义。”^①只是由于当时残疾人教育的重要性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所以前去学习者寥寥无几。1912年,上海盲童学堂设置了师范部,不管是残疾人、还是身体健全者,凡有志于研习盲哑师范教育并将来愿意服务于盲哑学校者,均为招生对象。“希望它能成为一所模范学校”,“希望为中国的盲人教育提供师资。”^②传教士培养残疾人教育师资有两种方式。其一,在教育残疾学生时,讲授相关理论和实践,引导他们毕业之后从事残疾人教育;其二,开设师范部或培训班,招收身体健全者或残疾人前来进修、学习。烟台启喑学馆是最早实践培训残疾人教育师资的机构之一。1912年至1915年之间,就有福州美以美大学毕业生黄爱香,周天孚的哥哥、杭州大学毕业生周广达,齐鲁大学毕业生杜文昌等人参加了培训。可以说,最早的残疾人学校的国人教师,几乎都是由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们成为20世纪20年代之后创办残疾人学校的最重要力量。传教士的这一活动符合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需要,在近代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传教士还通过各种方式提倡、鼓励和援助国人创办残疾人学校,实现中国的残疾人教育主要应当由中国人来承担的目标。1908年,米斯尔夫人率领师生巡回演讲,总督杨士骧答应尽快在直隶省创办聋校,并赞助了1000元,保定府的地方行政长官也积极行动,翌年即创办了保定聋哑学校,烟台启喑学馆派出孙宗石前去担任教师,^③开启了国人创办残疾人学校的新时期。

民国初期,从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学校毕业的第一批学生,模仿母校的设置,满怀帮助同病改变命运的信念,开始了创办残疾人学校的尝试。烟台启喑学馆的毕业生郭明理、周天孚、王凤英、黄爱香,汉口训盲书院的毕业生刘先骕等人或者自主创办残疾人学校,或者开设私塾式的残疾人教育班,或者应聘担任教师,参与教育残疾学生活动。传教士对中国人创办的残疾人学校通常持鼓励和支持态度,并采取各种方法援助这些学校。诸如派遣骨干教师帮助培训教师,前去调查和观摩,找出问题,帮助克服,进行业务上的指导和经费的资助。1914年2月,烟台启喑学馆的毕业生周天孚返回杭州创办了杭州聋哑学校,米尔斯夫人常去该校指导工作,建议他们再送一名教师到烟台启喑学馆接受培训,还帮助该校从美国得到了167.15美元捐款。1916年,张謇创办狼山南通盲哑学校,烟台启喑学馆派出教师毕庶沅前去帮助培训了8名教师,1918年结束时又将教师王国坤带回考察了5天。^④可以说,早期国人创办的残疾人学校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传教士的影响,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与援助。

1912—1923年是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残疾人教育事业最辉煌的10年,发挥了主导和示范性的作用,得到了政府、社会民众的理解与支持:“过去中国人对我们的工作存有很多疑虑,但现在则完全不同了。湖南地方报纸上曾发表过几篇文章,对我们的工作表示谢意,同时指出类似工作在中国人中实在贫乏。”^⑤这番言论言之成理,并不过分:传教士不仅发展和规范了由他们创办的残疾人学校,而且直接促进了国人创办残疾人学校的活动。

① 孙桂华、刘秋芳:《烟台启喑》,第13、53页。

② 《上海市盲童学校建校90周年纪念集》,2002年,第28—32页。

③ 孙桂华、刘秋芳:《烟台启喑》,第81页。

④ 同上,第114、162、115、113页。

⑤ School for Blind Girls, Changsha, Hunan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年,第327页。

四、促进残疾人教育中国化的转向：1924—1949

截至20世纪20年代，传教士作为创办近代中国残疾人教育事业的重要阶层，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以致他们信心满怀地说：“在中国真正为盲人服务的工作都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完成的。”^①表达了只有他们才能给中国残疾人带来福音和希望的信念。

但就在此时，中国的有识之士明确提出了近代残疾人教育事业虽由传教士开创，但是最终必须由中国人来承担的见解。张謇早在1912年就指出：“盲哑累累，教育无人。将欲延聘西师乎？资重而不可以时得，权且不操于我。”^②此番言论主要涵盖两方面的内容：中国的残疾人教育事业主要应当由中国人来发展的民族自尊心和必须由中国人发展的规律。前者表达了有识之士的觉醒，而后者则反映了有识之士的信心。尽管由于时代的原因，当时他的主张曲高和寡，并未得到其他有识之士的响应，却表达出了只有中国人才是发展中国残疾人教育事业推动力的卓绝见解。

1924年爆发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加速了中国残疾人教育事业发展的轨迹的改变。政府此后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修正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私立学校规程》、《私立学校校董会设立规程》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其基本要点为，禁止教会开设小学教育；传教士创办的各类机构必须向当地政府登记；外国人不能担任校长或董事长，华人必须占董事会的半数；学校不得以传播宗教为宗旨；学校课程须遵照部定标准，不得强制推行宗教必修课和礼拜。相关规定措辞严厉，一改此前“积极主动式的引导其立案注册的政策”为必须向政府登记。受此影响，各地方政府相继颁布了一批地方法令和法规，有些省份甚至提出了比中央政府更为严厉的口号，禁止传教士染指中国的教育事业。

虽然政府并没有出台专门针对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教育的法律法规，但是，有关文件明确了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学校属于外国人捐资学校之列，适用于私立学校的相关规定。1930年，教育部第2474号指令浙江省教育厅：“私立聋哑学校之立案程序，在本部未有特别规定以前，应比照私立学校规程办理。”^③受到“收回教育权运动”严峻形势的影响，“包括北京瞽叟通文馆在内的大部分教会特殊学校都向中国当局注册，成为私立学校”。^④这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

但在实际操作上，政府的审批依然相当宽松，虽有极个别的学校被退回材料要求重新申请，通常都能被批准，从而取得合法地位。诚如缪秋笙所言，“只要教会学校请求考核承认，政府宽大为怀，不分中外，一视同仁，准予依照私立学校手续办理。”^⑤当时，除了极少数学校因“西教士尽去，学校由彼等（华人）主持管理”，^⑥或“交由中国人办理”之外，并没有发生“外人在华设办的特殊教育机构也多由中国人收回自办”^⑦的严重状态。甚至有些传教士并不理会中国政府的严令要求，没有前去登记；一些学校主持工作的仍然是传教士。创办于1898年的福州灵光盲人学校，长期以来主持校务的均为传教士，直至1944年，圣公会才委任华人李孟雄为校长。创办于1908年的长沙瞽女院在长达43年间主持工作的顾蒙恩、丹蒙安、梵贵英、梅树资等人均为德国女传教士。^⑧在教学内容和办学宗旨方面，宣传教义和发展教徒仍为一些学校所坚持、强

① 弗赖尔：《与中国盲人在一起》，《中国特殊教育史资料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12页。

② 张謇：《张謇全集》（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06—407页。

③ 《私立聋哑学校立案程序》，《教育法令汇编》，无锡锡成公司，1933年，第596—597页。

④⑦ 郭卫东：《北京瞽叟通文馆与中国盲文体系的初建》，《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⑤ 缪秋笙、毕范宇：《中等教育的过去与现在》，《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5卷第4期，1929年12月。

⑥ 福建来稿：《两年来之重要发展》，《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1期（上），1929—1930年。

⑧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教育志》，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105—1106页。

调。1929年,福州灵光盲人学校公开声称:“宗教课未尝废弛”,虽不再强调必修,却开设了更多的宗教选修课,并以形式多样的主日活动来吸引学生,“若校中之青年会,其精神之活泼,祈祷之热心,又如邀请各地教牧来校宣讲,举行研究会、音乐会等,在在皆足以表证宗教生活之进步。”^①古田盲人学校则将宗教活动融入于日常生活之中,逢礼拜日,学员结队到三保萃贤堂参加礼拜仪式。^②上引资料显示,一些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学校在声势浩大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竟然拒不执行国家的规定,却没有得到政府的遏制与地方民众的反对,成了“世外桃源”。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和政府要求大力发展残疾人教育事业的阶段。1922年颁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强调:对于精神上或身体上有缺陷者,应施以相当之特种教育。^③但是当时中国的残疾人众多,而学校极其缺少,亟待加速发展,传教士与国人之间并不存在竞争。从本质上来说,近代中国残疾人教育界的“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基本精神凸显出的是中国化的趋向,即把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学校纳入政府的管理体系之中,并非要把参与残疾人教育事业的传教士拒之门外,或剥夺他们办学的权利。“教育不是慈善事业,所以特殊教育学校,只能拿慈善机关所创办的为补助,而不能以他为满足。”^④“教会或私人慈善团体办理的,站在社会道义的立场上,他们对于这些特殊儿童施以教育,这种服务精神是值得佩服的。但是因为这种团体极少,并且经济力量微弱,而且教育内容和方法都是问题,如果把教育2700多万特殊儿童的责任委诸他们,其不能胜任是无疑的。”^⑤表达了社会和学界对于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学校的定位和基本态度。“收回教育权运动”伴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民众情绪,这往往会影响政府的决策和执行力度。与传教士创办的其他事业相比,这一历史时期的民众对于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学校并不反感,舆论对传教士较为有利。“近今欧西学者,因创盲哑特殊教育,竟使一般盲哑之人,亦有求学机关,陶之冶之,克以常人等,诂不甚快……昔人有言:‘人定可以胜天’,观乎盲哑教育,乃益佩其伟大。”^⑥“救济盲人,是教会所已办的事业中一个特色的事业,是足以使人钦仰的。”^⑦而且,残疾人教育事业是一项回报很少、甚至没有回报的社会公益性事业,其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外和个人捐赠,相当一部分入学者既免除学费、书费,还提供伙食费。如此行径当然深得民众的信任和欢迎。在残疾人教育界,传教士与中国同仁关系较好,互相帮助、支持。与其他领域相比,“收回教育权运动”在残疾人教育领域进行得相当温和,各项要求贯彻得并不彻底。

但是,受“收回教育权运动”影响,向中国政府登记的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学校占了多数,并随之发生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变化。这些学校在向中国政府登记之后,被列入了中国教育体系之中,接受政府的管理和指导,势必根据相关规定和要求进一步做出适当调整。学校的校长和董事长通常不再由传教士或外国人担任。1947年9月,重庆市私立聋哑补习学校提名英国人韩世英担任董事长,重庆市教育局明确批示:“外国人不得充任董事长,应另选一人充任。”^⑧福州明道盲童女校立案时的校长虽然还是西人,随后便由英国教士兰克琳交权于华人校长张宠恩。^⑨在教学内容和办学宗旨上,多数学校也能执行教育必须与宗教分离的规定,不再把宗教科目列为必

①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1期(上),1929—1930年。

② 福建圣公会:《福声》,第3卷,1933年第1号。

③ 《学校系统改革案》,《新教育》,第5卷第5期,1922年12月。

④ 周予同:《中国特殊教育问题》,《教育杂志》,1922年第2期。

⑤ 陈鹤琴:《关于特殊儿童教育》,《陈鹤琴特殊教育文选及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⑥ 恕:《伟大的盲哑教育》,《盲哑》,1936年11月创刊号。

⑦ 李孟雄:《非常时期中教会对于盲人事业》,《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月刊》,1943年10月第10卷第5期。

⑧ 《重庆市教育局稿》(1947年9月13日),重庆市档案馆:0065—3—840,全宗名,重庆市教育局。

⑨ Miss Lamb:《福州明道盲童女校概况》,《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1期(上),1929—1930年。

修科目,不再强迫学生必须参加宗教仪式,一些学校修订了办学宗旨,删除了有关培养教徒的内容。上海福哑学校把办校宗旨调整为:“培育聋哑健全体格,陶冶聋哑良好品质,造就聋哑优秀人才,发展聋哑处世技能,本造福聋哑之旨,化分利之残废成生利有用之国民为宗旨。”^① 进一步淡化宗教色彩,强调残疾人教育的世俗性和社会意义。

传教士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的对策和态度明显博得了政府的赞赏和信任。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充分发挥传教士的作用,以促进残疾人教育事业的发展。1943年,成都基督教盲哑学校受省教育厅和中国盲民福利协进会委托,代办盲哑教育师资训练班,不久,改名为盲哑师资训练班。省教育厅拨给了3名教师的编制和经费,中国盲民福利协进会负责建班费和日常经费。^② 1931年,傅步兰被大夏大学聘为教授,在中国的大学最早开设了盲哑教育课程,讲授盲哑教育。对于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学校所取得的成就,政府也大加褒扬。1928年,上海盲童学校近30名盲生赴南京参加中学生运动会,获得了金质奖章。1933年2月16日,中华民国政府主席蒋介石视察参观福州灵光盲童学校,称赞盲校的办学成绩为全国盲校之冠。^③ 1933年12月,宋美龄参观建瓯心光女盲校,特别加以奖励,并购买心光盲校纺织品多件。^④ 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学校在立案之后,作为教育事业的一部分,得到了政府的拨款资助。1929年至1934年,广州明心瞽目学校的年经费为12700元—13000元,内由教育局每年补助5289元。^⑤ 1931年4月,傅步兰作为中国代表出席美国国际盲人会议,上海有关民间组织及外省市兄弟学校共捐款3490余元,其中王正廷2500元,孔祥熙300元。^⑥ 传教士从西方来到中国创办残疾人学校,既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理念与实践,同时离不开中国社会的支持与援助。

在政府和社会的理解与支持下,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学校在“收回教育权运动”期间不仅没有出现“外国教会人员不再兴办特教机构”^⑦的局面,而且还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和扩张。1932年,天主教宣道会美籍瑞典人艾瑞英创建私立武昌瑞英聋哑学校,初办时只有教师1人、学生六七人,三四年之后,学生则增至50人。^⑧ 1942年,基督教美国中华圣公会牧师傅雅各和其妻芮若兰创办安顺黔光瞽目学校,芮若兰任校长。^⑨ ……原先创办的一些学校的规模也有所扩大。1929年,上海盲童学校新建校舍12座,约达4700平方米。^⑩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众开始关心和重视残疾人教育的发展,而“收回教育权运动”又促进了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教师合作办学的发展趋势,在传教士创办的学校中,教师开始主要由中国人来担任,逐步表现出中国人办学的主体作用。1926年,烟台启喑学馆共有教职员11名,除了校长葛爱德之外,其余10名均为中国人。^⑪ 上海盲童学堂:“在表面上看起来,这学校是由外国人在创导,实际的辛苦工作者却是中国人,副校长是沈士芳,教务主任范福保,教员有盲先

① 《社会教育局立案上海福哑学校概况》,1936年、1937年、193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全宗号第5卷,卷号11910。

② 成都市教育委员会教育志办公室:《成都市教育史志资料》,1990年,第96页。

③ 《福州灵光盲童学校欢迎蒋主席及省委》,《福生》,1934年4月第25期。

④ 吴望基:《建瓯县心光盲蒙院院长赵玛丽亚师姑小史》,《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月刊》,第1卷第12期,1934年12月。

⑤ 《瞽目教育》,《广州年鉴》,1935年第12卷。

⑥ 《上海市盲童学校建校90周年纪念集》,2002年,第28—32页。

⑦ 郭卫东:《基督教会与近代上海的特殊教育》,《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⑧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教育志》,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09页。

⑨ 邓清秀:《安顺黔光盲哑学校概况》,《梦圆忆当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92页。

⑩ 《上海盲童学校简史》,《上海市盲童学校建校90周年纪念集》,2002年。

⑪ 孙桂华、刘秋芳:《烟台启喑》,第176页。

生7位,助教3位,目力好的教员有5位,管理员3位。”^①有些学校虽由传教士创办、任校长,而日常教学工作则完全交给中国人管理和实施教育。创办于1926年的上海福哑学校由傅步兰任校长,但实际负责校务的却是中国人汪镜渊。1938年美国传教士宋希伯创办私立盲童职业学校,负责经费的筹集,而由中国盲人汤正祥任校长,负责教务。^②中国人教师的增多,一定程度改变了学校发展的方向和轨迹,促使残疾人教育事业的中国化转型。

日本侵华期间,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教育事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挫折。社会“秩序大乱,既难维持现状,安能谋求进步?迨至民国三十一年冬,日本与英美开战,资金冻结,经费中断,当此之时,不但工作受阻,及衣食之资,亦时虞不给矣。翌年八月,日军嫉视院务,遣员收估,名为整理,实则破坏。遂至教育颓弛,工业滞顿,百端俱废,一筹不展,盲童学生流散离去者不可胜计。”^③主持学校工作的传教士有些被遣送回国,有些被关押,学校日趋衰落。在这危急时期,一些毕业于残疾人学校的学生挺身而出,接管了学校,坚持办学。1943年主持广州明心瞽目院校务的美国传教士撤回美国,外国的捐款断绝,黄雪静首任中国人校长,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靠伐树、种菜、卖鞋和衣服等自力更生,维持了明心的生存。^④

就在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教育事业受到重大挫折之时,由中国人尤其是残疾人创办的残疾人学校却大量问世,改变了中国残疾人事业主要由传教士创办的局面,实现了近代残疾人事业中国化的转型。据不完全统计,1901—1920年之间,教会共创办盲童学校29所,招收盲生784名,毕业生有121名,^⑤而同期由中国人创办的残疾人学校还不足10所。民国一朝,由绅商和知识分子创办的残疾人学校共有30余所。20年代之后,残疾人取代传教士、绅商、知识分子成为创办残疾人学校的最重要的社会阶层,至1949年10月,仅聋人就创办了31所聋校(部分学校创办不久即关闭),占当时全国聋校总数的70%以上。^⑥由国家、地方政府及民众创办的残疾人学校在数量上占了绝对多数。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大多数残疾人学校的创办者都是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学校的毕业生。

五、结 语

近代中国残疾人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3方面的特征。首先,具有时代的特征。尽管中国残疾人教育事业起步较晚,落后于西方国家几十年,但是却改变了传统社会的残疾人救助模式和理念。中国传统社会的残疾人救济思想的最基本特征是“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虽然能解决残疾人的部分生活问题,让他们得以生存下来,但是却不能使之自立自强、提高社会地位、根本改变命运,只能称之为是消极的残疾人救济举措。在近代残疾人学校创办之后,残疾人通过学习,掌握了交流手段,提高了自身素质,学会了一技之长,改变了昔日只能依赖他人救济生活的状况,走上了自谋其生之路。这是积极的残疾人救济举措。其次,近代中国战乱不断、统治阶级腐败、社会黑暗等因素致使近代中国残疾人教育事业发展缓慢,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是学校既少,且规模较小,只有少数残疾人才有机会进入学校学习,满足不了更多残疾人入学的要求,也不可能根本改变残疾人的命运。动员全社会力量发展残疾人教育、创造条件让所有残疾人能够

① 文军:《参观虹桥盲童学校》,《大公报》,1948年3月9日。

② 罗福鑫:《南京特教史》,《中国特殊教育史资料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78页。

③ 《北平启明瞽目院募捐启》,北京档案馆馆藏资料。

④ 鲍静静:《近代中国的盲人特殊教育——以广州明心瞽目院为例》,《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⑤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945—946页。

⑥ 陈少毅:《重视发挥聋人教师在聋教育中的作用》,《现代特殊教育》,2004年第7—8期。

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的真正实现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再次，近代中国残疾人学校由传教士最早创办，但是单凭他们的力量是不可能根本改变中国残疾人的命运的，残疾人教育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

尽管如此，在中国残疾人事业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的发展过程中，传教士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

虽然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使命是传教，而且在实施残疾人教育中也从来没有忘记传教，但是进入中国的传教士率先引进西方近代残疾人教育思想，创办残疾人学校，开启了中国近代残疾人教育之门，积极实践残疾人教育，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其历史功绩应当充分肯定。

还值得注意的是，创办残疾人学校的传教士大多提倡残疾人学校不应该附属于教会，在行政上应当独立，并且主张传教与发展残疾人教育相分离，淡化宗教色彩。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舍弃了宗教及其传教的使命，但是强调残疾人教育的独立性，有利于残疾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为外来宗教人员的传教士在中国创办和发展残疾人事业，还能够重视与中国政府和民众保持联系与互动，基本上能够服从和遵守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向中国政府立案，取得合法地位，并按照相关要求调整办学宗旨和教学内容。这些转变和活动博得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肯定、好评和支持。在这些学校立案之后，不仅取得了合法地位，而且得到了政府采用拨款资助、名流受邀担任董事、地方人士捐款帮助等支持，使得学校发展顺利，更好地发挥作用。

在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学校中还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残疾人教育师资。这些毕业生在民国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满怀为残疾同胞服务的信念，积极参与残疾人教育活动，加快了残疾人教育事业发展的步伐，促进了残疾人教育事业中国化的实现。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学校也为当代中国残疾人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解放初期，相当一部分学校就是在传教士创办的残疾人学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教士编写的教材、在教学中的尝试及积累的经验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残疾人教育的有益参考。

（责任编辑：于 光）